

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主编
陈众议

Марина
Ивановна
Цветаева
茨维塔耶娃研究文集

Критические статьи о творчестве Марины Цветаевой

荣洁 编选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
主编
陈众议



茨维塔耶娃研究文集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о творчестве Мариной Цветаевой

荣洁 编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茨维塔耶娃研究文集 / 荣洁编选.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14. 9
(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 / 陈众议主编)
ISBN 978-7-5447-4255-9

I. ①茨… II. ①荣… III. ①茨维塔耶娃(1892～1941)—人物研究—文集 ②茨维塔耶娃(1892～1941)—文学研究—文集
IV. ①K835. 125. 6—53 ②I512. 06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14126 号



声 明

由于条件限制，经过多方努力，本社仍未能与本书部分作品的权利人取得联系，在此恳请权利人予以谅解和支持。相关权利人可随时与本社联系，联系邮箱：rights@yilin.com。我们会立即向权利人补偿相关版权费用。

译林出版社

Notice

The proprietors of some articles in this book could not be reached after numerous attempts and the best efforts of Yilin Press. Please contact us at rights@yilin.com for licensing fees for these pieces. Many thanks for your understanding and support.

Yilin Press, Ltd.

总序

在众多现代学科中,有一门过程学。在各种过程研究中,有一种新兴技术叫生物过程技术,它的任务是用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对生物有机体进行不同层次的定向研究,以求人工控制和操作生命过程,兼而塑造新的物种、新的生命。文学研究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过程研究,从作家的创作过程到读者的接受过程,而作品则是其最为重要的介质或对象。问题是,生物有机体虽活犹死,盖因细胞的每一次裂变即意味着一次死亡;而文学作品却往往虽死犹活,因为莎士比亚是“说不尽”的,“一百个读者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

换言之,文学经典的产生往往建立在对以往经典的传承、翻新乃至反动(或几者兼有之)的基础之上。传承和翻新不必说,即使反动,也每每无损以往作品的生命力,反而能使它们获得某种新生。这就使得文学不仅迥异于科学,而且迥异于它的近亲——历史。套用阿瑞提的话说,如果没有哥伦布,迟早会有人发现美洲;如果伽利略没有发现太阳黑子,也总会有人发现。同样,历史可以重写,也不断地在重写,用克罗齐的话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但是,如果没有莎士比亚,又会有谁来创作《哈姆雷特》呢?有了《哈姆雷特》,又会有谁来重写它呢?即使有人重写,他们缘何不仅无损于莎士比亚的光辉,反而能使他获得新生,甚至更加辉煌灿烂呢?

这自然是由文学的特殊性所决定的,盖因文学是加法,是并存,是无数“这一个”之和。鲁迅谓文学最不势利,马克思关于古希腊神话的“童年说”和“武库说”更是众所周知。同时,文学是各民族的认知、价值、情感、审美和语言等诸多因素的综合体现。因此,文学既是民族文化及民族向心力、认同感的重要基础,也是使之立于世界之林而不轻易被同化的鲜活基因。也就是说,大到世界观,小到生活习俗,文学在各民族文化中起

到了染色体的功用。独特的染色体保证了各民族在共通或相似的物质文明进程中保持着不断变化却又不可淹没的个性。惟其如此，世界文学和文化生态才丰富多彩，也才需要东西南北的相互交流和借鉴。同时，古今中外，文学终究是一时一地世道人心的艺术呈现，建立在无数个人基础之上，并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地表达与传递、塑造与擢升着各民族活的灵魂。这正是文学不可或缺、无可取代的永久价值与恒久魅力之所在。

于是，文学犹如生活本身，是一篇亘古而来、今犹未竟的大文章。

此外，较之于创作，文学研究则更具有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属性，因而更取决于生产力和社会形态、社会发展水平。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之一。如是，我国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研究起步较晚，外国文学研究更是如此。虽然以鲁迅为旗手的新文学运动十分重视外国文学，但从实际成果看，1949年前的外国文学研究却基本上属于旁批眉注、前言后记式的简单介绍，既不系统，也不深入。因此，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几乎可以说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全面展开的，而系统的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这还是第一次。

学术史研究也是一种过程学，而且是一种相对纯粹的过程学。不具备一定的学术史视野，哪怕是潜在的学术史视野，任何经典作家作品研究几乎都是不能想象的。

然而，后现代主义解构的结果是绝对的相对性取代了相对的绝对性。于是，许多人不屑于相对客观的学术史研究而热衷于空洞的理论了。在一些人眼里，甚至连相对客观的真理观也消释殆尽了。于是，过去的“一里不同俗，十里言语殊”，成了如今的言人人殊。于是，众声喧哗，且言必称狂欢，言必称多元，言必称虚拟和不确定。这对谁最有利呢？也许是跨国资本吧。无论解构主义者初衷如何，解构风潮的实际效果是：不仅相当程度上消解了真善美与假恶丑的界限，甚至对国家意识形态，至少是某些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民族凝聚力都构成了威胁。然而，所谓的“文明冲突”归根结底是利益冲突，而“人权高于主权”这样的时鲜谬论也只有在跨国公司时代才可能产生。

且说经典在后现代语境中首当其冲，成为解构对象，它们不是被迫

“淡出”，便是横遭肢解。所谓的文学终结论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它与其说指向创作实际，毋宁说是指向传统认知、价值和审美取向的全方位的颠覆。因此，经典的重构多少具有拨乱反正的意义。

正是基于上述原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于2004年着手设计“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工程”计划，并于翌年将该计划列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十一五规划”。这是一项向着重构的整合工程，它的应运而生，标志着外文所在原有的“三套丛书”（即20世纪60至90年代——“文革”时期中断——的“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外国古典文艺理论丛书”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等工作的基础上又迈出了新的一步，也意味着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已开始对解构风潮之后的学术相对化、碎片化和虚无化进行较为系统的清算。

于是，关乎经典的一系列问题将在这一系统工程中被重新提出。比如，何为经典？经典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经典重在表现人类的永恒矛盾（用钱锺书的话说是“两足动物的基本神性”）呢，还是主要指向时代社会的现实矛盾？它们在认知方式、价值判断、审美取向方面有何特征？经典及经典批评与时代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关系何如？批评及批评家的作用（包括其立场、观点、方法及其与时代社会的一般和特殊关系）又如何？此外，经典作家的遭际与性情、阅历与禀赋，经典的内容与形式、继承与创新，以及文学的一般规律和文学经典的特殊性等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将是本工程需要展示并探讨的。

且说世界文学一路走来，其规律并非羚羊挂角，无迹可寻。童年的神话、少年的史诗、青年的戏剧、中年的小说、老年的传记是一种概括。由高向低、由外而内、由强至弱、由大到小等等，也不失为一种轨迹。如是，文学从摹仿到独白、从反映到窥视、从典型到畸形、从审美到审丑、从载道到自慰、从崇高到渺小、从庄严到调笑……终于一头扎进了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死胡同。小我取代了大我，观念取代了情节；“阿基琉斯的愤怒”变成了麦田里的脏话；“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变成了“我做的馅饼是世界上最好吃的”；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是谓下现实主义。当然，这不能涵盖文学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事实上，认知与价值、审美与方法等等的背反或迎合、持守或规避所在皆是。况且，无论“六经注我”还是“我注六经”，经典是说不尽的，这也是由时代社会及经典本身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所生发的。

众所周知，文学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向来重视文学，尤其是经典作家在反映和揭示社会本质方面的作用。马克思在分析英国社会时就曾指出，英国现实主义作家“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比一切职业政客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恩格斯也说，他从巴尔扎克那里学到的东西，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列宁则干脆地称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这并不是说只有文学才能揭示真理，而是说伟大作家所描绘的生活、所表现的情感、所刻画的人物往往不同于一般抽象的概括、数据的统计。文学更加具体、更加逼真，因而也更加感人、更加传神。其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载道与传道功能更不待言。站在世纪的高度和民族立场上重新审视外国文学，梳理其经典，展开研究之研究，将不仅有助于我们把握世界文明的律动和了解不同民族的个性，而且有利于深化中外文化交流，从而为我们借鉴和吸收优秀文明成果、为中国文学及文化的发展提供有益的“他山之石”。胡锦涛前不久说过，“我们必须准确把握当代世界和中国发展变化的大势，坚持立足国情，同时又吸收世界文化的优秀成果；坚持立足当代，同时又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这和“洋为中用”、“古为今用”思想一脉相承。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学作为人文精神的重要基础和介质，既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见证，同时也是一时一地人心、民心的最深刻、最具体的体现，而外国文学则是建立在外国各民族无数作家基础上的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认识观、价值观和审美观的形象反映。研究人心自然不能停留在简单抽象的理念上，因此，走进经典永远是了解此时此地、彼时彼地人心、民心的最佳途径。换言之，文学创作及其研究指向各民族变化着的活的灵魂，而其中的经典（包括其经典化或非经典化过程）恰恰是这些变化着的活的灵魂的集中体现。

如是，“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立足国情，立足当代，从我出发，以我为主，瞄准外国文学经典作家作品和思潮流派，进行历时和共时的梳理。其中第一、第二系列由十六部学术史研究专著、十六部配套译著组成：第一系列涉及塞万提斯、歌德、雨果、左拉、庞德、高尔基、肖洛霍夫和海明

威；第二系列包括普希金、茨维塔耶娃、康拉德、狄更斯、哈代、菲茨杰拉德、索尔·贝娄和芥川龙之介。

三

格物致知，信而有证；厘清源流，以裨甄别。“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中的经典作家作品学术史研究系列，顾名思义都是学术史研究（或谓研究之研究）。学术史研究既是对一般博士论文的基本要求，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文学研究方法，更是一种切实可行的文化积累工程，同时还可以杜绝有关领域的低水平重复。每一部学术史研究著作通过尽可能抽丝剥茧式的梳理，即使不能见人所未见、言人所未言，至少也能老老实实地将有关作家作品的研究成果（包括有关研究家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公之于众，以裨来者考。如能温故知新，有所创建，则读者幸甚，学界幸甚。相配套的经典论文翻译，则遴选有关作家作品研究的阶段性和标志性成果，其形式类似于外文所先前出版的“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书”。

此次面世的“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中的每一部学术史研究著作将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经典作家（作品）的学术史梳理。这是相对客观的，但其中的艰难也不可小觑。首先，学术史梳理既不像平素泛舟书海，拾贝书海，尽意兴而为之的俯拾由己和随心所欲；其次，牵涉语种繁多，而且经过 20 世纪的形形色色的方法论和批评思潮的浸染，用汗牛充栋来形容经典作家作品研究成果已不为过。因此，要在浩如烟海的研究史料中攫取最有代表性的观点和方法，实在是件考验耐心和毅力的事情。战战兢兢，生怕挂一漏万，自不待言，且挂一漏万在所难免。因此，我们只能择要概述，甚至把侧重点放在经典作家的代表作上。不然纵使篇幅再大，也难以涵括浩瀚的文献资料。换言之，去芜杂的枝蔓和重复的敷衍，留精粹要义和真知灼见是必然的，但也是不容易做到的。它考验我们涉猎的深度和广度，而且也是检验我们学术水准和价值判断的重要环节。

第二部分研究之研究何啻是一大考验。都说 20 世纪是批评的世纪，在经历了现代主义的标新立异和后现代主义的解构风潮之后，在各种思潮、各种方法杂然纷呈的情况下，如何言之有物、言之成理、不炒冷饭，殊是不易；如何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发现、有所前进，就更是难上加难。反过来看，正因为文化相对主义的盛行和批评的多元，也才有了我们展示立

场、发表见解的特殊理由和广阔余地。举个简单的例子，解构主义针对二元论的颠覆虽然是形而上学的，却不可谓不彻底。其结果是相当一部分学者怀疑甚至放弃了二元思维，但事实上，二元思维不仅难以消解，而且在可以想见的未来仍将是人类思维的主要方法。真假、善恶、美丑、你我、男女、东方和西方等等实际存在，并将继续存在。与此同时，作为中国学者，面对西方话语，我们并非无话可说。总之，从文学出发，关心小我与大我、外力与内因、形式与内容、反映与想象、情节与观念，以至于物质与精神、肉体与灵魂、西方与东方等诸如此类的二元问题，以及经典在民族和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依然可以是我们的着力点。当然，二元论决不是排中律，而是在辩证法的基础上融会二元关系及二元之间所蕴藏的丰富内涵和无限可能性。毋庸讳言，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解放思想，广开言路，但日新月异中不乏矫枉过正、时髦是趋。比如大到存在与意识、物质与精神的辩证关系，小到客观与主观、客体与主体等等，都大有乾坤倒转、黑洞化吸之势。至于意识形态“淡化”之后，跨国资本主义的一元化意识形态更是有增无已；真假不辨、善恶不论、美丑混淆的现象所在皆是；个人主义大行其道，从而使抽象的人性淹没了社会性；普世主义势不可挡，以致文化相对主义甚嚣尘上。文学从大我到小我，从外向到内倾，从摹仿到虚拟，从代言到众声喧哗，真实给虚幻让步，艺术向资本低头；对妖魔鬼怪和封建迷信津津乐道，任帝王将相和无厘头充斥视阈，能不发人深省？然而，经典作家是说不尽的，以上的任何一位作家都是无法穷尽的。用巴尔加斯·略萨的话说，伟大的经典具有“自我翻新”的本领。至于何为经典，虽然也是个说不尽的话题，但用简单的方式综观前人的观点，也许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一是它们必须体现时代社会（及民族）的最高认知和一般价值（包括人类永恒的主题、永恒的矛盾）；二是其方法的魅力及审美的高度不会随着岁月的更迭而褪色或销蚀。当然这是将复杂问题简单化的一种说法。而本课题便是关乎经典其所以成为经典的一种较为复杂的论证方式。需要说明的是，经典不等于市场。用桑塔亚那的话说，经典不在于一时一地喜欢者的多寡，而在于喜欢者的喜欢程度。如果在此基础上再加上一个历史的维度，那么这话也就更加全面了。

学术史研究的最后部分为文献目录。它在尽可能详尽的基础上，还要有所选择。不然，展示一个经典作家的学术史，光文献目录就可以编辑厚厚的几大本。因此，去粗存精，是为重要或主要文献目录。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的中长期目标是在作家作品和流派思潮研究的同时，进行更具问题意识的学术史乃至学科史研究，以期点面结合，庶乎“既见树木，又见森林”，若能密切联系实际，促进中华学术的繁荣、发展和创新，则读者幸甚，我等幸甚。无疑，此工程面向全国高校及科研机构，希望有志于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的同仁踊跃加盟、不吝赐教。

陈众议

2010年1月

编选者序

玛丽娜·茨维塔耶娃为我深爱的俄罗斯诗人。爱她，不仅因为她是“20世纪第一诗人”，爱她，还因其活得真诚，活得有个性。生在1892年的玛丽娜，从小就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生活体验。其父伊凡·茨维塔耶夫，一个痛失爱妻、膝下有一儿一女的鳏夫；玛莉娅·梅茵，一个极有天赋的钢琴家，离开自己的恋人，与四十四岁的莫斯科大学语文学教授、古希腊文化学家茨维塔耶夫结为伉俪，成为两个孩子的继母。她把爱给了失去母亲的瓦列莉娅和安德烈，给予他们无私的照顾，而对自己的亲生骨肉则管教甚严，以至于小玛丽娜总有一种不被妈妈喜爱的感觉。她在《鞭笞派女教徒》中甚至渴望被“圣母”——鞭笞派女教徒带走，认为她们爱她胜于母亲。可以说，自幼年起，玛丽娜就对爱、对属于自己的那份爱，有一种特别执着的追求。对爱的渴求伴随其一生。

自然，爱成了她的创作中不止的音符。她写对诗人的爱、对朋友的爱、对熟人的爱，甚至还有对陌生人的爱。她的爱热烈、大胆、奔放、真诚，让人心潮澎湃，她的爱有时犹如决堤的洪水，让人惊叹于它的气势，对之怀有莫名的恐惧。在她的笔下，对亲人的爱流淌甚少，然而一经流出，就让人读到心痛。因为对创作的爱，她才有了属于自己的那份孤独。她的孤独，映照出的是一种诗人的境界。

她写诗，以自己理解的方式写诗，她把对世界和人的感受通过诗歌即时表达出来，所以她的诗给人留下的印象十分鲜明，甚至刻骨铭心。它让读者仿佛与诗人处于同一个时空中。她的诗具有独特的印记，感情太激烈，太丰富，乃至笔尖无法追上主人的思绪，所以有了茨维塔耶娃式的标点符号、茨维塔耶娃式的句法；词典中的词语已无法表达诗人的情感，于是有了茨维塔耶娃式的随机词、个人词语。她的诗穿过了神话和传说，穿过了历史和现实，穿过了日常生活和存在的本质，她的诗歌世界就是一个

宇宙。

她活得真,心无城府。她爱和敬重所有值得她爱和敬重的人,她把他们的情感毫无保留地通过献诗表达出来。她或许是20世纪写献诗最多、最真诚的诗人。

也许,正因如此,她的诗歌、她的作品一经问世,便马上引起评论者的关注。由于对她个人及其作品的不同解读,有了或赞或贬的评论声音。

收入本评论集的文章有四十一篇。这些文章仅是茨维塔耶娃研究的沧海一粟,但它们却横跨百年的时间长度,论及茨维塔耶娃其人其作的方方面面,且观点独特。作者中有白银时代的名家勃留索夫、安德烈·别雷、古米廖夫、沃洛申、曼德尔斯塔姆等,有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帕斯捷尔纳克、布罗茨基等,有俄侨文学界颇具影响力的诗人、评论家霍达谢维奇、阿达莫维奇、巴赫拉赫、斯洛尼姆等,有对茨维塔耶娃持独到见解的爱伦堡、伊瓦斯克、司徒卢威等,有从女诗人角度关照女诗人创作的莎吉娘,有对茨维塔耶娃作跟进式研究的俄侨文学史家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有对茨维塔耶娃某部作品进行诗学分析的文学理论家加斯帕罗夫、洛特曼等等。这样的名单足以说明茨维塔耶娃的文学成就和影响力。很多文章作者对茨维塔耶娃的每一部新诗集、每一部新作品都发表自己的意见。象征派诗人勃留索夫的评价可谓一语中的:“读她的诗时,有那么一阵子,你会觉得很不自在,好像向别人家半开的窗里窥视了一眼,并在无意中看到了旁人不该看到的一幕。”沃洛申指出了茨维塔耶娃创作中最宝贵的特点:“善于准确地表现出她对内部世界的观察。她用印象主义手法记录下每一个瞬间,这说明,这部诗集具有纪实特征。”安德烈·别雷向茨维塔耶娃致以一个诗人对另一个诗人的敬意,他对女诗人的诗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强调了茨维塔耶娃诗歌中的音乐性和抒情性特征。霍达谢维奇重点分析了茨维塔耶娃童话长诗的诗学特征,阐释了其诗歌创作中的民间文学因素等问题,并认为,茨维塔耶娃的童话诗以抒情歌曲为依托,既叙事,又歌唱,用声音歌唱、“哭诉”。阿达莫维奇指出了诗人创作中的另一个典型特点,他说:“茨维塔耶娃的诗是最最高意义上的情爱作品,它们放射着爱情的光芒,充满爱,它们仿佛冲向世界,并试图把整个世界揽入怀中。这是作品最优美的特点。她的诗写得真诚、大气……读茨维塔耶娃的诗,人可以变得更好、更善良、更高尚、更富有自我牺牲精神。”莎吉娘以一个女诗人的情怀客观地评价了茨维塔耶娃其人和创作

的特点：“她是一个有相当正确理解和判断力，而且武装得相当好的人，虽然她不与任何人争斗，但是她却时刻准备迎接任何挑战。”帕斯捷尔纳克对茨维塔耶娃坦诚地说出了对《捕鼠者》内容和形式的看法，对该作品独特的韵律大加赞赏。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对茨维塔耶娃的研究细致、深入，在分析《终结之诗》时，把它与《尤利西斯》进行了对比，由此指出该作品的独特性：“……不断地把‘印象’转换成极巧妙的想象，从生活转向诗歌。她给人以视觉、口头、辩证想象在快速运动的印象。”这只是他对茨维塔耶娃研究的一个小点。本论集中我们翻译了他的四篇文章，他在其中很有见地地分析了《捕鼠者》、《勇士》等作品。斯洛尼姆在数篇文章中分析了茨维塔耶娃的创作，他认为，茨维塔耶娃凡事追求探究本质，撕去幻想的面纱，她的唯一目标就是要深入到思想、人和自然的核心、本质中。她的这种极端性、深刻性与其紧张的精神生活和高涨的激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其成为当代最有激情的俄罗斯诗人。斯洛尼姆对其诗歌独有的语言形式颇有感触：“句子仿佛被砍断，而且有时被砍断后的诗行，没有结尾，没有谓语。经常不使用动词，有意截断句子，刻意追求电报效果。她的长诗《骑在红色的骏马上》充满一连串的感叹、单独的词语和短句。”爱伦堡关于“茨维塔耶娃是一个快乐、迷人的多神教教徒，但她不是希腊多神教教徒，而是地道的俄罗斯多神教教徒”的结论为后世研究茨维塔耶娃的学者提供了广阔的思考空间。加斯帕罗夫和洛特曼“庖丁解牛”式地分析了茨维塔耶娃的若干诗艺特征。布罗茨基认真地说道，茨维塔耶娃是俄罗斯最真诚的诗人之一，20世纪的第一诗人是茨维塔耶娃。他为何有这样的看法，看完他的文章我们就会茅塞顿开……

研究茨维塔耶娃不是一件易事。她如变换不断的云，在你就要抓住它的时候，它已从你身边飘走，飘到另一个让你着迷的地方。研究者需不断前行，才能深入诗人的世界。

茨维塔耶娃研究尚在进行。翻译错误在所难免，恳请读者不吝赐正。且行且研究，且行且认知，且行且修正。

荣洁

2014年7月26日

编选者序 1

第一辑 诗人的评论

女人的诗歌 3

沃洛申

新诗集 (摘录) 8

勃留索夫

关于茨维塔耶娃的《致勃洛克》 10

勃留索夫

关于俄罗斯诗歌的书信之一 (摘录) 13

古米廖夫

关于俄罗斯诗歌的书信之二 (摘录) 15

——茨维塔耶娃的《魔灯》

古米廖夫

1

目 录*

女人的手工制品 (摘录) 16

戈罗捷茨基

文学莫斯科 (摘录) 19

曼德尔施塔姆

女诗人—歌手 21

安德烈·别雷

简评玛·茨维塔耶娃的《手艺集》和《普叙赫》 26

霍达谢维奇

关于茨维塔耶娃的《勇士》 28

霍达谢维奇

* “诗人的评论”与“评论家的评论”这样的分辑并非很绝对：有少部分的诗人也是评论家；而个别的评论家也是诗人。

论茨维塔耶娃的诗集《离开俄罗斯后》 33

霍达谢维奇

茨维塔耶娃的新诗集《离开俄罗斯后》 37

阿达莫维奇

文学日记

——玛·茨维塔耶娃 41

莎吉娘

来自写给茨维塔耶娃的信札 50

帕斯捷尔纳克

关于玛丽娜·茨维塔耶娃的对话：

1980年春—1990年秋 60

布罗茨基 沃尔科夫

关于一首献诗 74

布罗茨基

玛丽娜·茨维塔耶娃 115

罗日杰斯特文斯基

茨维塔耶娃研究文集 玛丽娜·茨维塔耶娃的书(摘录) 129

安托科利斯基

2

第二辑 评论家(及文艺理论家、小说家等)的评论

诗人茨维塔耶娃 143

奥索尔金

韵律的诗歌 147

巴赫拉赫

俄罗斯诗歌的现状:玛丽娜·茨维塔耶娃 153

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

玛丽娜·茨维塔耶娃 155

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

关于玛丽娜·茨维塔耶娃的童话长诗《勇士》 159

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

茨维塔耶娃的《捕鼠者》	164
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		
关于茨维塔耶娃的诗集《离开俄罗斯后》	167
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		
简评玛丽娜·茨维塔耶娃的诗集《离别集》	169
斯洛尼姆		
玛丽娜·茨维塔耶娃	172
斯洛尼姆		
茨维塔耶娃	180
伊瓦斯克		
新斯巴达人(《题目的设定》之一)	187
伊瓦斯克		
茨维塔耶娃的早期创作	192
伊瓦斯克		
玛丽娜·伊凡诺夫娜·茨维塔耶娃	197
爱伦堡		
玛丽娜·茨维塔耶娃的诗歌作品	200
爱伦堡		
关于玛丽娜·茨维塔耶娃的诗集	212
捷林斯基		
茨维塔耶娃和她的散文	222
古里		
关于玛丽娜·茨维塔耶娃散文的一些思考	231
菲利波夫		
玛丽娜·茨维塔耶娃	234
——从生活诗学到词语诗学		
加斯帕罗夫		
玛·茨维塔耶娃	250
洛特曼		